

略论安史之乱后剑南道对唐朝的作用

李剑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 重庆 400715)

【摘要】安史之乱后,唐朝迅速由盛转衰,内有藩镇割据,独霸一方,不受朝廷节制,外有吐蕃、南诏等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侵扰。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唐朝还能够维持近一个半世纪,这其中,剑南道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对维系唐朝统治起了重大的作用。

【关键词】剑南;安史之乱;吐蕃;南诏

唐朝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极其重要,它把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推到了一个高峰。前人和现今的学者对于唐朝的研究也可谓是硕果累累,如陈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李锦绣老师的《唐代经济史稿》等等。但是,相对而言,关于剑南道对唐朝后期作用的研究就比较少。现在我们就从军事、经济、政治这三个方面,针对剑南道对唐朝后期的作用略加论述。

一、唐朝抵御少数民族政权侵扰的重要屏障

剑南道本巴蜀之故地,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 627 年),改州、郡制,在全国设十道,剑南道下辖汉州、彭州、蜀州、眉州、锦州、剑州、梓州、阆州、果州、遂州、普州、陵州、资州、荣州、简州、嘉州、邛州、雅州、黎州、泸州、茂州、翼州、涂州、炎州、彻州、向州、冉州、穹州、笮州、戎州、嵩州、松州、文州、扶州、龙州、当州、悉州、恭州、保州、真州、霸州、柘州、成都府。七五七年(至德二年)分为东川、西川。东川治梓州(今四川三台),领梓、遂、绵、普、陵、泸、荣、剑、龙、昌、渝十二州。约相当于今四川盆地中部涪江流域以西,沱江下游流域以及剑阁、青川等县地。西川治成都府,领成都府及彭、蜀、汉、眉、嘉、邛、简、资、茂、黎、雅以西诸州,约当今四川成都平原及其以北、以西和雅砻江以东的地区。^[1]虽然在各不同时期,剑南管辖的具体位置和地名会有所变动,但总体来说剑南大致是拥巴蜀之地。从地形上看“其地四塞,山川重阻”^[2],正如张荣强描述的那样“巴蜀盆地四周群山环绕,东有巫山,南有大娄山、大凉山,西有龙门山、大岭山,北有米仓山、大巴山”。^[3]

吐蕃本土西羌属……散处河、湟、江、岷间……居析支水西。^[4]

南诏“居永昌、姚州之间……西北与吐蕃相接,南女王,西南骠,北抵益州,东北际黔、巫”。^[5]由三者的地理位置可以看出,剑南道是西邻吐蕃、生羌,南接南诏、南平獠,

而吐蕃和南诏这两个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又经常侵扰唐朝。很自然地,剑南道就成为了唐朝抵御他们侵扰的屏障和前沿阵。有唐一朝,吐蕃与唐朝的战争就经常发生,如武德六年“四月己酉陷芳州”^[6],贞观十二年“八月壬寅,吐蕃寇松州,侯君集为当弥道行军大总管,帅三总管兵以伐之”^[7],仪凤二年“五月吐蕃寇扶州”^[8],甚至是文成公主入藏这样一个创造唐蕃短暂和平的千古美谈,也是在“阔水道行军总管牛进达及吐蕃战于松州,败之”^[9]之后,吐蕃见自己的实力无法与唐廷对抗,转而请求通婚和亲的。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国势渐衰。各地节度使“喜则连横以叛上,怒则以力而相并”^[10],对抗中央,不受朝廷节制。面对唐廷如此情况,吐蕃对唐的侵扰就更加肆无忌惮了。如《资治通鉴》所述:大历十三年“乙亥,吐蕃遣其将马重英率众四万寇灵州”^[11],更有甚者,贞元七年“己丑,吐蕃陷麟州,杀刺史郭锋,夷其城郭,掠居人及党项部而去”^[12]。面对吐蕃咄咄逼人的不断侵扰,虽然唐廷也取得了部分的胜利,如德宗贞元十八年的维州之战就“擒论莽热,士卒死者大半”^[13],但仅从文献的记载的文字来看,我们就可知唐抗御吐蕃的侵扰上是越来越费力了,因前期记载吐蕃的侵扰主要是“寇”,而安史之乱以后则大部分是“陷”,其程度之不同跃然纸上。

南诏相对唐与吐蕃而言是相对弱势的。唐朝前期,唐与南诏的关系还是不错的。南诏对唐廷也侍奉甚谨,“率种归城,累代如此”^[14],唐朝对南诏也是积极扶持。助其“尽占‘西洱河蛮旧地’,削平‘三浪’(浪穹诏、遣谟诏、施浪诏),占领‘河蛮’旧地,败越析诏,尽辖越析区域”^[15],进而驱洱海地区的吐蕃势力,统一六诏。虽然,南诏的强大对于唐朝抗御吐蕃的入侵有很大的作用,但是强大后的南诏也“渐骄大,入朝,天子亦为加礼”。^[16]

唐玄宗后期开始,军备松弛,政治腐败,民族矛盾尖锐。这个时候,南诏逐渐强大起来,与唐朝的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加上时任姚州都督、云南太守张乾随的所作所为终于引

发天宝年间南诏与唐朝的一次大战。天宝战争使南诏“遂北臣吐蕃”，还受到了“吐蕃以为弟”的礼遇^[17]，进而与吐蕃联合起来进攻唐朝。虽然，后来的点苍山会盟，南诏又重新站到了唐朝一边，但是随着南诏的对外扩张，其与唐廷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尤其是太和年间，嵯颠专政，他四处发动掳掠战争。并撕毁了盟约，对成都发动了大规模的掳掠性战争。“（大和三年）十一月，蜀川出军与站，不利。陷我邛周，逼成都府，入梓州西郭，驱劫玉帛子女而去。”^[18]这次战争给成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自唐一朝近三百年，虽然吐蕃与唐朝的战争时常发生；虽然南诏也时叛时降、反复无常；有时甚至两者联合起来对抗唐朝。尤其是在唐朝后期，吐蕃自西北向关中地区发动进攻，南诏自南而上，但是唐朝却没有因为少数民族政权的侵略灭亡。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剑南道对西南少数民族的入侵起了一个屏障的作用。无论是吐蕃还是南诏，他们都与剑南道接壤，剑南道就像一座无法逾越的大山一样，挡在吐蕃和南诏的面前。尤其是唐朝后期，唐朝面临着严峻的内忧。各地节度使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不受中央节制，如果这个时候再有西南少数民族对统治中心的威胁，那对奄奄一息的唐朝来说是致命的。同样，这个时候唐廷也明白剑南道对于维护其统治的重要性。无怪乎，杜元颖、郭钊等不能修边事之徒难以担当该处防务的大任。唐廷也不惜用韦皋、李德裕等良将名相来经营此边远之地，尤其是李德裕治蜀期间。正如李义让和贺锡玉在《李德裕治蜀》中所归纳的那样，他雷厉风行地采取了诸如“至南诏查访被俘民众”，“巩固关防，训练士卒，修理兵器”，“招纳吐蕃之维州守将”等等措施。^[19]从而加强了剑南道的防御能力，再加上剑南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交通，一道抵御少数民族政权侵扰的屏障就形成了。

二、唐朝后期的两大财政支柱之一

剑南道拥巴蜀之地，自古以来就被称为“天府之国”。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争的影响，大批的北人南迁，剑南的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至唐朝，剑南道虽然曾发生过数次小规模战争，但总体来说经济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唐李善注有赋说：“沟洫脉散，疆理绮错，黍稷油油，粳稻莫莫……夹江傍山，栋宇相望，桑梓接连，家有盐泉之井，户有橘柚之园”^[20]，这种说法可能有点夸张，但是由此可知当时的剑南道的经济还是十分繁荣的。

建唐之初，“时天下饥乱，唯蜀中丰静”^[21]，当时，剑南道就给唐朝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财政支持。

元和期间诸道各州的税额及其税率

| 地区 | 两税钱物斛斗 | 备注 | 史料来源 |
|------------------|---------------------|----------------------------------|-----------|
| 浙西 | 减放上供钱 34 万贯 | 元和户 31.3772 万 | 册府 491 |
| 剑南西川 | 两税榷酒钱 56 万贯、米 14 万石 | 加留州送使约 134.2 万贯 元和户 13.0839 万 | 册府 491 |
| 河南、河中、同华、晋绛陕虢坊丹延 | 送上都及留郡、留都府钱 81 万贯夏税 | 元和户 10.0871 万 | 册府 502 |
| 郛曹濮 | 上供两税榷酒钱 15 万贯、粟 5 万 | | 册府 374484 |
| 横海 | 以税钱 12 万贯资易定 | 元和户 11539 | 册府 176 |
| 淄青 | 上供 19.3986 万 | | 上供 484 |

像“武德二年闰二月，大府少卿李袭誉运剑南之米，以实京师”^[22]的事例屡见史册。剑南不仅仅是农业很发达，其手工业也很繁荣，特别是丝织业。根据卢华语、劳允兴两位先生统计，本区的丝织品 36 种中有 24 种充贡；麻织品 18 种，充贡者达 14 种之多。可见当时剑南地丝织品的水平之高。甚至可以用丝织品代替租调，《新唐书》中载为“扬州租调以钱，岭南以米，安南以丝，益州以罗、绸、绫、绢供春彩”^[23]。后来，随着各地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剑南道的作用也慢慢地变得不那么突出了，默默地为帝国的繁荣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迅速由盛转衰，各地节度使“郡邑官吏皆自署置，户版不籍于天府，赋税不入于朝廷”^[24]。以两税钱额的上供为例，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央对地方控制力的减弱。

建中以后两税钱额表（单位：万贯）：

| 时间 | 两税钱 | 青苗钱 | 总计 |
|------|--------|-----|---------|
| 建中元年 | 950 | 140 | 1090 |
| 建中三年 | 1140 | 140 | 1280 |
| 元和初 | 893.76 | 140 | 1033.76 |
| 开成初 | 827 | 140 | 967 |
| 大中中 | 719 | 140 | 859 |

（来自：李锦绣. 唐代经济史稿[M].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P666.）

面对这种情况，唐廷也只能采取姑息之策。但是对于赋税重地江淮、巴蜀，唐廷则加以严密控制。唐廷对地方的政策，正如陶懋炳先生说的那样：“严控扬益，维护漕道，确保关中，姑息河朔。”^[25]这个时候唐朝的经济来源完全依赖于江淮、巴蜀之地。江淮是唐朝财政最为倚重的地区，但在此我们就不详加论述。巴蜀的财政实力虽不及江淮，但它也是唐朝后期的两大财政支柱之一，地位及其重要。有时候甚至靠巴蜀一地之赋而养关中。正如杜甫所言：“河南、河北贡奉未入，江淮转于难时，唯独剑南，自用兵以来，税敛则殷，部领不绝，琼林诸库，仰给最多，是蜀之土地膏腴，物产繁富，足以供王命也。”^[26]

安史之乱使各地的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但由于剑南道“其地四塞，山川重阻”^[27]的地理环境，反而受战争的影响相对较小，并“恃险而富”^[28]。对中央的财政也是予以巨大的支持。

| | | | |
|-------|--------------------------------|------------------------|---------------|
| 和州 | 户 1.8 万, 税钱 16 万 | | 刘禹锡集 8 |
| 泸州 | 输扬州米万石 | | 全唐文 612 |
| 江州 | 缗钱粟帛, 动盈万数 | | 全唐文 689 |
| 黄州 | 户不满 2 万, 税钱 3 万贯 | 元和户 5054 | 樊川文集 15 |
| 杭州 | 10 万户, 税钱 50 万 | 元和户 5. 1276 | 樊川文集 16 |
| 苏州 | 户 14. 3261, 两税茶酒等钱 69. 2885076 | 元和户 10. 088 万 | 吴地记 |
| 楚州 | 征赋 2 万记 | | 全唐文 763 |
| 宜州南陵县 | 税钱 3 万 | 望州、宜州 10 县元和户 5. 735 万 | 元稹集 54 |
| 桂州阳朔 | 籍户 5 千, 税缗钱千万 | 中下县、桂县 10 县元和户 8650 | 全唐文 718 |
| 河南府 | 岁入钱以千记者五、六十万 | 元和户 18799 | 韩昌黎文集 校注 6 |

| | |
|---------|----------|
| 河南河中同华等 | 夏税 8. 03 |
| 剑南西川 | 10. 26 |
| 横海 | 20. 8 |
| 黄州 | 5. 94 |
| 和州 | 5. 89 |
| 杭州 | 9. 75 |
| 苏州 | 6. 87 |
| 南陵县 | 5. 23 |
| 阳朔县 | 11. 56 |
| 河南府 | 29. 26 |
| 平均 | 12. 46 |

(来自: 李锦绣. 唐代经济史稿[M].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P655、566、567.)

通过两个表格的对比, 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现象。(一) 河南府的税额如此之高, 原因是其人口实数远不止 18799 户, 而是由于唐朝后期户籍申报多非实数, 北方隐户不报的现象十分严重, 故其税率较高, 在此不予以考虑。(二) 我们来比较一下剑南西川与唐朝税赋重地江淮道。元和时江淮八道 49 州 144 万户, 总税额应为 1056. 96 万, 上供部分约为 592 万余贯, 约占国家财政收入的 69%, 唐朝对其的仰仗可向而知。但江淮八道的平均税率是多少呢? 据黄、和、杭、苏、南陵县的税率统计, 平均税率约为 7. 34 贯。而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 剑南西川的税率为 10. 26 贯, 远远高出江淮八道。因此, 剑南道对唐朝财政的巨大支持就一目了然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唐末时期, 剑南的盐税给唐廷的财政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唐有盐池十八, 井六百四十……邛、眉、嘉有井十三, 剑南西川院领之。梓、遂、锦、合、昌渝、泸、资、荣、凌、简有井四百六十, 剑南东川院领之。”^[29]足见剑南地在全国盐业中的重要地位。安史之乱以后, 盐税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税收, 元和二年, 西南井盐收入约为 50 万贯。宪宗征讨淮西时“度支使皇甫传加剑南东西两川、山南西道盐估以供军”,^[30]甚至有“天下之赋。盐利居半”之说。^[31]特别在韦皋、李德裕等硕德名臣治蜀期间, 巴蜀的社会经济得到了很大的恢复与发展。“皋在蜀二十一年, 重加赋敛, 丰贡献以结主恩……府库既实, 时宽其民, 三年一复租税”,^[32]甚至有“日进”之举^[33]。李德裕在蜀期间加强

边防, 注重农事, 移风易俗, 使“蜀民粗安”。正是由于有了剑南地的财政支持, 唐王朝在安史之乱后, 面对内忧外患才能够延续着衰弱的生命, 残喘了近一个半世纪。等到唐僖宗回长安后, “国命所能制者, 河西、山南、剑南数十州, 大约部将自擅, 常赋殆绝, 蕃侯废置, 不自朝廷, 王业于是荡然”^[34], 失去了江淮、剑南的财赋支持, 唐朝也只能面对灭亡的命运了。

三、唐朝战略转移的后方基地

唐朝后期, 剑南地以其独有的地理区位、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其他方面的种种优势, 成为了唐王朝的战略大后方, 成为动荡时期, 唐皇的必奔之处, 更是两次挽救唐廷于危难之中。剑南地之所以能够成为唐廷的战略大后方, 除了上文所述的经济发达以外, 还有其他各个方面的原因, 但最主要的有两个方面: 关中不稳、蜀地可恃。

唐朝后期, 各地节度使拥兵自重, 如弘镇、宣武“十余年不入朝, 颇以兵力自负”^[35], 朝廷虽然对他们姑息养之, 但是他们却仍不知自持, “喜则连横以抗上, 怒则以力而相并”^[36]。安史之乱后, 大大小小的节度使都称霸一方, 各种势力都在摩拳擦掌, 企图逐鹿中原。唐朝的统治中心关中地区处于各藩镇和少数民族政权的环伺之中, 西有吐蕃之侵扰, 晋军之势大; 北有契丹之进逼; 东有朱全忠之虎视, 唐廷处于“朝覲久废, 河、湟陷没, 烽侯列于郊甸”^[37]的境地。吐蕃等少数民族的侵扰战争, 让唐都长安始终不得安宁。仅代宗一朝, 京师就为吐蕃而两度戒严。一为永泰元年“吐蕃寇醴泉, 奉天、党项、羌寇同州……京师戒严”, 一区, 藩镇混战对该地区的经济和社会都带来了巨大的动荡。像大顺二年(八九一年), 唐廷仅为革杨复恭一人之职, 导致李茂贞等节度使与杨复恭众人的大战, 为“二年, 九月甲寅吐蕃寇灵州……京师戒严”^[38]。以后诸朝, 吐蕃对京师的威胁也不无存在。再者, 大小藩镇之间的地盘争夺战主要就是发生在关中、河朔地区。最后, 藩镇坐大之后, 就剑指长安, 不可一世。建中四年十月“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反, 犯京师”^[39]。到唐朝末年时期, 各强藩悍镇过京师更是如游自家后院一般。李克用、朱温等枭雄就不必说了, 连朱玫等宵小叛将也可以入长安而另立皇帝。此种情况之下, 关中岂能安哉?

与关中不稳不同, 剑南可以成为唐朝可以依赖的后方基地, 是“剑南可恃”。剑南之所以能够担此大任是由历史的

偶然性与必然性相结合的结果,偶然性自不必说,必然性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

首先,剑南地有其他各地无法比拟的区位优势。上文已经提到过,唐安史之乱后,能控制的地区虽较以前减少了很多,但绝不仅仅只剩剑南道一处。当时至少江淮地区还在朝廷的控制之中,且该处的经济实力也不亚于剑南地,然只有剑南能担当战略大后方这样一个重任,何也?因其区位也。“唐都长安,蜀在近户之外”^[40],此毗邻之区位使唐退可安身以立命,进可复祖先之宗庙,岂是万里之外的江淮可以为之?故唐廷若舍近而求远,岂不怪哉?

其次,剑南地本身的地形地势也有能力担此重任。剑南地势多险峻,李白的《蜀道难》有形象的描述“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扞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巉岩不可攀。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飞湍瀑流争喧豗,砢崖转石万壑雷。其险也如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41]此文虽有夸张,但足见剑南地势之险要。上文也曾提过,“巴蜀盆地群山环绕,东有巫山,南有大娄山、大凉山,西有龙门山、大岭山,北有米仓山、大巴山”^[42],北段崇山峻岭,栈道重重;东面为三峡之水,水急、滩险、峡多、谷深,难以逾越;西面为高原所阻,平均海拔三千公尺以上,沙鲁里山、大雪山、邛崃山逶迤而南,为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等急流割裂成深邃的峡谷^[4]。由上述我们可以看出,剑南地四面中三面为绝地,其一面不可图,是为战略后方之最佳选择。难怪乎当年诸葛亮与刘备曰:“益州险要,沃野千里,天府之土”^[43],希其据此而三分天下,以图中国。

由此,我们可知在唐朝安史之乱后,剑南道有优势和能力担当战略大后方这样一个角色,同时它也很好充当了这个角色,其两度挽救唐朝于危难之中,功劳卓著。顾炎武也就此评论道:“唐都长安,每有寇则为出奔之举,恃有蜀也。所以再奔再北,而未至亡国,亦幸有蜀也。”^[44]

小结

纵观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可以发现,剑南道对于日益衰弱的唐朝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无论是在政治、经济、军事还是在其他各个方面都给予了唐朝以巨大的支持,其作用也是远远大于其他各道。但是它不可能挽救唐朝灭亡的命运,仅仅只是延缓了唐朝灭亡的时间而已,因为历史的轨迹是向前发展的。

注释与参考文献:

[1]陶懋炳.五代史略[M].人民出版社,1985.

[2]隋书·卷二九·地理志[M].中华书局,1973,P830.

[3]张荣强.唐前期剑南道财赋地位及其特征[J].中国农史,2003

(4).

[4]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上.

[5]新唐书·卷二二二·南蛮上.

[6]新唐书·卷一·本纪第一·高祖.

[7]新唐书·卷二·本纪第二·太宗.

[8]新唐书·卷三·本纪第三·高宗.

[9]新唐书·卷二·本纪第二·太宗.

[10]新唐书·卷六四·藩镇表序.

[11]资治通鉴·卷二二五·代宗大历十三年.

[12]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德宗贞元十七年.

[13]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德宗贞元十八年.

[14]全唐文·卷二八七·第三册·张九龄·敕西南王大首领蒙归义书[M].中华书局影印,1982.

[15]欧小兰.天宝至大和年间南诏与唐朝关系考[J].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2).转自:马曜.云南简史[M].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P73.

[16][17][18]新唐书·卷二二二·南蛮上.

[19]李义让,贺锡玉.李德裕治蜀[M].四川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20]唐李善注.文选·卷四·蜀都赋[M].中华书局,1956,P6258.

[21]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

[22]新唐书·卷五一·食货一.

[23]册府元龟·卷四九八·邦计部·漕运.

[24]旧唐书·卷一四一·田乘嗣传.

[25]陶懋炳.五代史略[M].人民出版社,1985.

[26]全唐文·卷三五·杜甫·为阆州王使君进论巴蜀安危表·卷六二四.

[27]隋书·卷二九·地理志[M].中华书局,1973,P830.

[28]新五代史·卷六三·世家.

[29][30][31]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四.

[32]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宪宗元和四年.

[33]新唐书·卷五二·食货志二.

[34]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纪.

[35]资治通鉴·卷二二九·宪宗元和九年.

[36]新唐书·卷六四·方镇表序.

[37]新唐书·卷五二·食货志二.

[38]新唐书·卷六·代宗.

[39]新唐书·卷七·德宗.

[40]宋丁,郭允蹈.蜀鉴·卷七.

[41]李太白文集[M].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42]童恩正注.古代的巴蜀[M].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

[43]三国志·卷三五·诸葛亮传第五.

[44]张荣强.唐前期剑南道财赋地位及其特征[J].转引自: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一册)[M].

作者简介: 李剑(1985-),男,湖南衡阳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史。

收稿日期: 2011-04-12